

总 序

改革开放前后的一个时期,中国译界学人对翻译的思考大多基于对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数次翻译高潮的考量与探讨。简言之,主要是对佛学译介、西学东渐与文学译介的主体、活动及结果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转向,让我们不断拓宽视野,对影响译介活动的诸要素及翻译之为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考察一国以往翻译之活动,必与该国的文化语境、民族兴亡和社会发展等诸维度相联系。三十多年来,国内译学界对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与“五四”前后的文学译介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西古今关系发生了变化,其态势从总体上看,可以说与“五四”前后的情形完全相反:中西古今关系之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变化。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中,新世纪的中西关系,出现了以“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诉求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输出为特征的新态势;而古今之变,则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中对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化传统与精华有了新的认识,完全不同于“五四”前后与“旧世界”和文化传统的彻底决裂

与革命。于是,就我们译学界而言,对翻译的思考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对翻译思考的路径和维度也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变化之一,涉及中西,便是由西学东渐转向中国文化“走出去”,呈东学西传之趋势。变化之二,涉及古今,便是从与“旧世界”的根本决裂转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价值观的重新认识与发扬。这两个根本性的转变给译学界提出了新的大问题:翻译在此转变中应承担怎样的责任?翻译在此转变中如何定位?翻译研究者应持有怎样的翻译观念?以研究“外译中”翻译历史与活动为基础的中国译学研究是否要与时俱进,把目光投向“中译外”的活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要向世界展示的是什么样的“中国文化”?当中国一改“五四”前后的“革命”与“决裂”态势,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在世界各地创建孔子学院、推广中国文化之时,“翻译什么”与“如何翻译”这双重之问也是我们译学界必须思考与回答的。

综观中华文化发展史,翻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一如季羨林先生所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翻译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在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表现尤为突出。从文化角度来考察翻译,我们可以看到,翻译活动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其形式与内涵在不断丰富,且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联系,这种联系不是被动的联系,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种建构性的力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重大力量,我们应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对翻译活

动进行思考,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为目标来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

基于这样的认识,也基于对翻译的重新定位和思考,浙江大学于2018年正式设立了“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旨在“传承文化之脉,发挥翻译之用,促进中外交流,拓展思想疆域,驱动思想创新”。中华译学馆的任务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在译的层面,推出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译丛,“译入”与“译出”互动,积极参与国家战略性的出版工程;在学的层面,就翻译活动所涉及的重大问题展开思考与探索,出版系列翻译研究丛书,举办翻译学术会议;在中外文化交流层面,举办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翻译家论坛,思想家、作家与翻译家对话等,以翻译与文学为核心开展系列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发展思路下,我们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合作,集合全国译学界的力量,推出具有学术性与开拓性的“中华翻译研究文库”。

积累与创新是学问之道,也将是本文库坚持的发展路径。本文库为开放性文库,不拘形式,以思想性与学术性为其衡量标准。我们对专著和论文(集)的遴选原则主要有四:一是研究的独创性,要有新意和价值,对整体翻译研究或翻译研究的某个领域有深入的思考,有自己的学术洞见;二是研究的系统性,围绕某一研究话题或领域,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合理的研究方法、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以及较大的后续研究空间;三是研究的社会性,鼓励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选题与研究,如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研究、语言服务行业与译者的职业发展研究、中国典籍对外译介与影响研究、翻译教育改革研究等;四是研

究的(跨)学科性,鼓励深入系统地探索翻译学领域的任一分支领域,如元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批评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技术研究等,同时鼓励从跨学科视角探索翻译的规律与奥秘。

青年学者是学科发展的希望,我们特别欢迎青年翻译学者向本文库积极投稿,我们将及时遴选有价值的著作予以出版,集中展现青年学者的学术面貌。在青年学者和资深学者的共同支持下,我们有信心把“中华翻译研究文库”打造成翻译研究领域的精品丛书。

许 钧

2018 年春

自序

2016年9月,我离开南京大学,回到家乡,到浙江大学工作,如今已经过去三年半了。到浙江大学一年后,浙江大学的吴雅兰女士曾到我办公室,与我聊到浙江大学后的感受、工作与收获。那次聊得很投机,我谈了自己的不少想法,谈话内容最后以《追求,一直在路上》^①为题,见于《浙江大学报》和国内不少公众号或网站。

回想这几年走的路,我发现自己当初的一些想法在浙江大学慢慢都实现了,尤其是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的成立,在中华文化遗产、中外文化交流、翻译学术探索等各个方面都做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工作。就我个人而言,在学科建设和青年教师培养方面,我做了很多的努力。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作为一位翻译学者,我也尽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比如作为南京申办世界文学之都的顾问之一,我曾于2018年10月底应邀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主持“城市的开放与文化的多元”论坛,并作为嘉宾,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部门协调和伙伴关系局局长杜越就文学和文化与城市发展、城市多元文化建设等重要议题展开讨论,为传播中华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做了积极的尝试。我还应国际法语国家组织的邀请,担任了该组织设立的五洲文学奖的评委,参加该文学奖的评奖工作,努力开拓中外文学的

^① 追求,一直在路上——对话来浙大“创业”的文科资深教授许钧. 浙江大学报, 2018-07-13(02).

交流途径。这些工作固然重要,也有意义,但作为一个学者,学术探索是其根本。虽然工作忙,活动多,身体也大不如以前,但我每天坚持读书与思考,就翻译、文学与文化问题进行探索。这次结集献给读者朋友的一些文字,就是我到浙江大学工作三年多来就翻译及相关问题展开思考的结晶。

对于翻译,我确实有过不少思考和研究,主要集中于几个层面。第一是翻译的理论层面,《翻译论》应该是主要的成果,围绕翻译的基本问题展开,由对翻译的本质特征入手,界定翻译,重点探讨翻译的理论问题。第二是翻译的实践层面,对翻译的活动、事件进行梳理与思考,由翻译的经验总结,导向翻译的理论升华,这方面有一些成果,如《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第三是翻译的历史层面,思考的对象是译介与接受问题,有总体的把握,也有个案的分析,成果有《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第四是翻译主体的层面,聚焦中华翻译历史中著名的翻译家,如傅雷,研究他的翻译艺术,探索他的精神世界,这方面有《傅雷翻译研究》问世。最近几年,我对翻译的思考没有停止。大家都知道,过去的这几年里,对我们翻译界来说,有一些值得特别纪念的重要历史时刻,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还有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结合五四运动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历程,我对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翻译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同时应《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中国翻译》等杂志的要求,或参加有关的学术研讨发表讲话,或撰写有关的纪念文章,如此,便有了这次结集出版的《关于翻译的新思考》,其中的“新”一词,有时间上的所指,因为收录的文章都是我在近三年多来发表的;也指思考的新拓展,尤其是对于翻译精神与价值的思考。

确实,近几年来,我特别关注翻译的精神与价值层面。从这部小集子所收录的文章看,虽然分为了四辑,但最为根本的,是对于翻译精神与翻译价值的探索。去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我应《中国翻译》邀请,撰写了《翻译精神与五四运动——试论翻译之于五四运动的意义》。结合五四运动的历史,我从语言、文学、文化、思想层面展开思考,就翻译与五四运动

的深刻联系以及翻译对五四运动的直接、间接的影响进行探讨,继而从翻译的开放与创造精神出发,就翻译之于五四运动的意义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地提出了翻译的开放精神与创造精神,以此去检视中华翻译史,也许会对很多问题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而与此相关的,我也特别关注翻译家的精神世界。在这部集子中,有我写余光中先生翻译活动的文章,也有我纪念法国文学翻译家郝运先生的文章,还有张柏然先生在病重时与我合写、发表于他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的文章。他们都离开我们了,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翻译精神永在。

关于翻译价值,我曾在2018年与翻译界同仁共同编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一书的后记中写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我们翻译学界而言,应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开放的精神,就是翻译的精神诉求。打破隔阂,开阔视野,促进理解与交流,拓展思想疆界,增进不同民族文明的互学互鉴,丰富与繁荣世界文化,是翻译的价值所在。”^①这是在新的历史时代对翻译基本价值的一种新的认识。三年前,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关于外语学科翻译成果认定的几个问题》,发表在《中国翻译》杂志2017年第2期上。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很明确,一是在实际的层面,为翻译成果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的认定提供某种评价参照;二是在理论的层面,希望引起翻译学界对翻译的价值进行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翻译活动很丰富,也很复杂。与翻译相关的问题很多,比如翻译与文学的关系,翻译与文化交流的关系,翻译与话语体系建设的关系,翻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系,对这些问题,我都有所涉及,但这些思考是初步的,有的还是肤浅的,我期待着中国的学界对翻译问题有更多的关注、更深入的思考。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覃江华副教授,感谢他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重

^① 许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8:254.

的时期能静心阅读这部集子所收录的所有文章,细心检查文中的疏漏,严格地调整文章的注释和格式。我还要感谢蓝红军教授、许多副教授、覃江华副教授和施雪莹博士与我一起思考翻译的问题,合作撰写有关的文章。

许 钧

2020年4月2日于南京黄埔花园

浙江大學出版社
浙江大學出版社所有

当下翻译研究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中国翻译研究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从整体情况看,有两点尤其显著:一是问题意识增强;二是研究路径多样。问题意识的增强,表现在翻译研究对国家战略需求的积极回应。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给中国翻译界提出不少需要关注并研究的问题。而研究路径的多样,一方面是因为新技术给翻译实证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新时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需要学界探求新的研究路径,以回应新时代对翻译学提出的挑战。在历史发生急剧或者重大变化的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往往会催生新的思想与观念,同样也会引起某些困惑与思考。前一个阶段,出于一个翻译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我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就翻译的本质问题、翻译的价值问题与翻译的伦理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也引发了不同的意见。我认为有必要针对译学界存在的一些困惑和不同观点,就当下翻译研究所关注的重点,集中地谈一谈近期我关注的几个方面的问题,旨在与同行交流,以期展开讨论,进一步深入探索和思考。

一、翻译应该如何定位?

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活动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学界予以了充分的关注,提出应该重新为翻译定位。2015年3月28—29日,在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召开了“何为翻译？——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的高层论坛。^①谢天振、王宁、仲伟合、穆雷、胡开宝等学者在会上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在这一时期国内召开的有关翻译学术研讨会对翻译重新定位问题也多有涉及。关于翻译的重新定位,《中国翻译》2015年第3期集中刊登了有关学者的看法。作为翻译学者,谢天振教授密切关注时代的发展与翻译活动的新变化,自觉而敏感地提出了重新定位与定义翻译的问题。他多次在会议上呼吁翻译学界对此问题展开讨论,而且就此问题明确表态,其基本观点有二:一是现行的翻译定义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二是翻译发生了重大变化,翻译应该重新定位。无论从理论自觉还是从观点的逻辑演进看,谢天振的观点无疑都值得重视,也正因为如此,他提出的重新定位翻译的呼吁得到了译学界的积极响应。其观点的具体内容,在其撰写的《现行翻译定义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对重新定位和定义翻译的几点反思》一文中明确的表达。既然是重新定位,就必然有对现行定位与定义的反思。那么,“现行的翻译定义”是什么呢?谢天振在文章中举了具有代表性的中西各两种定义:“中文以《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里对翻译的释义为代表。前者称:‘翻译: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后者说:‘翻译: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西方的定义则可以《牛津英语词典》里的释义为例:(a) ‘The action or process of turning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also, the product of this; a version in a different language’ (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行为或过程;亦指这一行为的结果;用另一种语言表述出来的文本。)(b) ‘to tur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to change into another language retaining the sense...’ (把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并保留原

① 蓝红军. 翻译本质的追寻与发现——“何为翻译？——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高层论坛综述. 东方翻译, 2015(2): 92-95.

意……) ”^①值得关注的是,谢天振列举的中西“现行”的对翻译的定义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样的翻译定义,翻译学界自然应该反思。但我有些困惑,如果我们翻译学界的讨论是以词典上的这几条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定义为基础的,那么近三十年来学界对翻译的探索及其研究成果应该如何看待呢?换句话说,翻译学界对翻译的重新定位和定义,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外翻译学界近三十年来对翻译的探索成果。对翻译的定义,一般会从形式与功能两个层面入手。谢天振列举的所谓的“现行”定义,就是从形式入手,对翻译活动加以定位,这样的定义是狭义的,也是不充分的。三十多年来,中外翻译学界对翻译不断探索,不断深化对翻译的认识。如果我们以这样的定义作为学界讨论翻译重新定位的基础,既不符合翻译学界的研究实际,也无益于推动对翻译的进一步探索。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到底应该如何为翻译定位呢?仲伟合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引导性。他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对翻译重新定位与定义应该考虑的几个因素》一文,针对学界对翻译的模糊认识,提出对翻译重新定位与定义,应该考虑如下的因素:一是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义与定位应当了解翻译的特征;二是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义与定位应当了解翻译的本质;三是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义与定位应当了解翻译所起的作用;四是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义还应该关注翻译活动及翻译学科发展的几个变化。^② 我很赞同仲伟合的观点,讨论翻译的重新定位问题,不应该忽视中外翻译学界对翻译的本质、作用、价值的深入思考,也不应该忽视学界获得的重要成果和研究进展。在仲伟合的文章中,他提出应该关注翻译活动及翻译学科发展中所出现的六个方面的变化,这一点,无疑受到谢天振有关观点的启发。我们特别注意谢天振提出的五个方面的变化,涉及翻译的主流对象、翻译的方式、翻译的工具与手段等等。他在第四个方面指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开

① 谢天振. 现行翻译定义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对重新定位和定义翻译的几点反思. 中国翻译, 2015(3): 14-15.

② 仲伟合. 对翻译重新定位与定义应该考虑的几个因素. 中国翻译, 2015(3): 11-12.

始积极主动地把自己的文化译介出去,以便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这样两千多年来以‘译入行为’为主的翻译活动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民族文化的外译也成为当前翻译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相应的,文化外译,包括相应的文化外译理论,正成为当前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①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我看来,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认识翻译与理解翻译,确实应该关注到翻译路径的变化和文化外译的研究状况。就总体而言,我认为对翻译的认识还应更进一步,其中有几点需要学界加以关注:一是要对翻译有本质的认识,必须认识翻译的本质性特征,尤其是正确认识符号创造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对于人类自身发展、社会进步与文化创造的重要贡献;二是认识翻译与理解翻译,应该树立历史的发展观;三是认识翻译与理解翻译,应该有对现实重大问题的关照;四是对翻译的定位与定义应站在跨文化交流的高度进行思考,以维护文化多样性为目标来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②

二、翻译的价值应该如何认识?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要为翻译定位,就应该了解翻译所起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翻译价值问题。之所以思考翻译的价值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各界,往往是在实用的层面考量翻译的作用。这样的一种状况直到现在还没有大的改变,有两种情况尤其值得重视。一是随着语言服务行业的兴起,翻译被定位于语言服务的范畴,这种定位容易将翻译的作用归结于其工具性。二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翻译界和文化界对于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或多或少表现出某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功利主义倾向”^③。工

① 谢天振. 现行翻译定义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对重新定位和定义翻译的几点反思. 中国翻译, 2015(3):15.

② 许钧. 关于新时期翻译与翻译问题的思考. 中国翻译, 2015(3):8-9.

③ 刘云虹. 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翻译历史观.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5(4):1.

具性与功利性这两种情况应该引起翻译学界的高度警觉,因为前一种情况把翻译的作用定位于实用层面,归结于工具性,必然导致矮化翻译的结果;而后一种情况缺乏对翻译复杂性的认识,只从市场角度评价翻译作为一种工程项目的即期效益,而未从精神建构的角度来衡量翻译作为一种促进人类文明交流和发展的事业所产生的长远的历史影响,急功近利,必然会导致翻译焦躁症与市场决定论。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翻译学界缺乏对翻译的价值观的指导,过分强调翻译活动的实践功能,在中国文学外译与传播的讨论中,强调以所谓的实际效果为准绳,忽视对翻译过程的多层面研究以及对翻译价值的深刻认识。

作为人类社会历史最悠久的活动之一,翻译对文化交流与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季羨林对此有重要的论述:“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灵应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①回望中国的近现代史,无论是梁启超、严复对西学的翻译,还是林纾对欧美小说的翻译,都通过对新思想、新精神、新文化的引进,启发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使他们受到了思想启蒙的洗礼。在新时期,翻译更是在我国的文化强国战略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翻译与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为新时期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我看来,建立翻译价值观,一方面要以对翻译之“用”的理论探讨与历史思考为基础,另一方面又要超越对翻译的实际之用的描述与分析,对翻译之“用”进行价值的是非评判。在与翻译批评学者刘云虹的一次对话中,我们提出“翻译界应立足于翻译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属性来认识翻译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翻译的符号转换性和创造性出发把握翻译的本质并真正理解翻译的建构性力量”,同时“应警惕翻译观念与翻译行为的

^① 季羨林,许钧.“翻译之为用大矣哉”//许钧.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增订本).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3.

功利主义倾向,以历史的目光与开放的视野,从历史发展和多元文化平等交流的高度考察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从而进一步认识与彰显翻译活动的各种价值”。^① 基于翻译的“社会性”“文化性”“符号转换性”“创造性”和“历史性”等本质特征,我认为翻译活动具有相应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及历史价值,这些观点在我的《翻译论》中有详细论述,这里择其要点做一陈述。

第一,翻译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翻译活动对社会交流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上。翻译因人类的交际需要而产生,在克服阻碍交流的语言差异的同时,翻译为交流打开了通道,人类社会从相互阻隔走向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狭隘走向开阔。翻译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既有精神之光芒,又有物质之果实。借助翻译,人类社会不断交流其创造的文明成果,互通有无,彼此促进。应该说,没有旨在沟通人类心灵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即我们所说的翻译活动,人类社会便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此外,翻译的社会价值,还表现为翻译对于民族精神的塑造力。翻译通过对他国先进科技文化的介绍,能够引进知识,开启民智,塑造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在特殊时期甚至能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二,翻译具有文化价值。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翻译活动集中体现了跨文化交流中可能出现的障碍和冲突,也能通过本领域的经验为其他形式的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达成提供借鉴。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同时又是民族文化在空间上的一种拓展,在内涵上的一种丰富。

第三,翻译的语言价值体现在符号的转换性。在某种意义上说,翻译

① 刘云虹,许钧. 如何把握翻译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 ——关于翻译本质的对谈. 中国外语,2016(2):95.

活动,必然有出发语与目的语的接触,而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以及两者的交锋有可能创生“第三种语言”,在从出发语到目的语的转换中,能够从句法、词汇等方面丰富并拓展后者。新词汇也意味着新观念,语言上的变化亦会对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造成影响,这就是鲁迅所提倡的通过翻译丰富汉语、改造国人思维方式的作用。翻译的价值,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中都有显著表现,这里不再赘述。

第四,翻译的创造价值彰显了翻译的精神,即敢于打开封闭的自我,在与“异”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中丰富自身的求新的创造精神,这种翻译精神构成了翻译的创造功能之源泉。而翻译打开的新的世界,更是为人们进行新的创造起到间接但却广泛的作用。以文学创作来说,不少当代作家在谈论自己的创作经历时,都会谈及自身从西方翻译文学中汲取的养分,谈及翻译的创造性及其对他们自身创作所产生的推动作用。

第五,翻译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我们要充分认识翻译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所做的实际贡献。考察人类文明发展史,我们发现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翻译,都伴随着翻译的高潮,如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复兴,往往以翻译为先锋。

关于翻译价值,我在《中国翻译》2017年第2期的一篇题为《关于外语学科翻译成果认定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也有涉及。从总体来看,翻译活动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及历史价值,突显了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的翻译的本质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翻译精神之体现。

在我们这个时代,翻译活动出现了新的特点,翻译活动的走向有了新的变化,社会开始特别关注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对外译介和传播,这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赋予了翻译更为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我们应该从自己的视角和立场出发争取发出更大的声音,对翻译活动及以此为依托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机制进行探索,提出建议,引导文化交流向更理智、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努力减少误读和误解,化解冲突,导向交流的平等对话和双赢结果。